

严明政治纪律 确保长期执政

——重读朱德任中央纪委书记期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论述

我们党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极其重要的保证就是纪律严明。1949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书记。朱德担任中央纪委书记前后共五年七个月，他表现出来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范，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 任 伟

战争年代，纪律是获取胜利的保证；和平年代，纪律是永保纯洁的前提。把纪律挺在前面，是当下全党的共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共产党人一路走来，从炮火纷飞到和平建设，虽然环境不同了，问题不同了，困惑与挑战也不同了，但遵守党的纪律是一贯要求。党的二大曾提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的朱德，是党内严守纪律的模范，对党的政治生活尤其是严守党纪有过很多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逐渐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重温朱德的有关论述，既是致敬先贤，亦可温故知新。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现的一些违纪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胜利容易使人骄傲，一些党员放松警惕，出现了一些贪腐违纪问题。1949年11月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以朱德为书记，由100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50年5月6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讲话。在

朱德看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党员违法乱纪现象哪怕只有一滴一点，都不可容忍。朱德讲：即使是很少数的党员有不好的言行，“那就会破坏党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望”。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哪些违法乱纪的“苗头”呢？朱德指出：第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下级党员干部，他们在进行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减租、土改等各项工作中，往往为了单纯地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采取了蛮横的不讲理的方法，随便捕人、吊打，或者纵容坏分子随便捕人、吊打而不闻不问。第二，官僚主义作风滋长。有些党员干部，不注意国家大事，不关心群众痛苦，工作疲塌松懈，得过且过，逐渐失去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第三，摆老资格、恃功挟赏。某些党员干部以功臣自居，认为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党和人民就必须给他们以很高的地位和待遇。他们看不起党外人士，看不起群众，轻视党的组织和纪律，轻视政府和法律。第四，贪污腐化的行为比过去增多了。少数党员干部进入城市后，享乐思想滋生，没有经受住“糖衣炮弹”的袭击，自甘堕落，从英雄沦为罪人。

庆幸的是，党中央发现问题苗头，立即成立纪委系统，并发起“三反”“五反”运动，第一时间根除弊病，既端正了党风，又保护了干部，不使其滑向更深渊，同时还赢得了民心。可见，从严治党，防患未然，实则是组织、社会、个人三方共赢。

克服错误、防范风险的方法与路径

亮明态度，坚定立场，是克服不正

之风的第一步。朱德曾任总司令，一些违法乱纪人员曾是他的部下，但朱德毫不庇护，更没有搞团团伙伙，而是亮明态度，严厉痛斥。朱德讲：“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如果哪一个同志以为自己有了不起的功劳，要党和人民给予他以很高的地位和待遇，这是完全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人物，即使你做得最好、贡献最大，也不过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我们共产党人胸襟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所谓‘善则归诸人，过则归诸己’。”共产党人不能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你们就会在革命队伍中掉下队来，失去了和革命同伴共同前进的机会”。这些话掷地有声，充分体现出他的人民立场。立场稳固，就不会出大错；自身硬，才有底气对抗不正之风。

澄清思想认识，坚定信念，是预防违法乱纪的有效手段。行为源于思想，如果思想动摇，行为就很可能出问题，走偏路、走邪路迟早难免。朱德1950年讲：“虽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几个曾经是强大的敌人，已基本上被我们打倒或即将完全被我们打倒，但是它们所遗留下来的恶劣的思想、作风和风俗习惯等等，还必须经过十分艰巨的、长期而坚韧的斗争才能逐渐消灭。”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战胜它、克服它，那它反过来就会影响我们。新形势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

思想教育 with 组织惩戒相结合，是从严治党的有力保障。思想教育润物细无声，组织惩戒必须雷霆万钧。朱德讲：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加强党内纪律教育之外，“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典型案件的处理，严肃地、慎重地、有

力地展开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侵蚀的斗争”，“只有从思想上、组织上两方面来巩固和纯洁我们的党，才能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才能保证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决议的正确实施”。刚柔并济是我们党治理沉痾的原则之一。严明政治纪律，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朱德所言：“党内的教育工作是主要的，必须不断地提高每个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才能使他们克服和避免错误。但是，对那些犯了错误仍不肯改正的同志，却必须执行纪律。”纪律执行又必须一视同仁，同样的问题，不能对有些人教育，对另一些人惩罚，尺度公平，才能服人心。朱德特别强调：“我们的党只有一种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独立王国的存在。”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要一视同仁，“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违反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纠正”。思想教育面前人人须过关，组织纪律面前人人须平等。破除“铁帽子王”的神话，既是从严治党的前提，亦是有效手段。

践行是最好的怀念

朱德担任中央纪委书记前后共五年七个月，为加强党的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讲：朱德“强调党执政后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适应长期执政的要求指明了方向”。

重温经典，不仅是怀念，更是要从中寻找养料，为未来指明道路。正如康克清同志所言：“对先行者的最好怀念，当然不是眼泪和誓言，而是怎样脚踏实地把他们的事迹推向前进，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

重读经典

《人物志》与人才评价

□ 李长庚

知人善用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古往今来，“用人失察失误”的现象不胜枚举。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说明了“用人失察失误”的危害。诸葛亮一生深谋远虑，明察秋毫，尚且避免不了用人失察失误，上演了“挥泪斩马谡”的历史悲剧，难怪他曾感叹说：“夫人之性最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如何知人善用，避免用人失察失误呢？三国时期刘劭所著的《人物志》是古代人才学的经典之作，列举了鉴别和考察人才时可能出现的七种失误，可贵我们借鉴。他说：“人物之理，妙而难明，以情鉴察，缪犹有七”。

“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考察人的声誉时有偏颇的谬误。刘劭认为，考察人才不在于获取情况的多少，关键要了解到真实情况。要了解真实情况，必须亲自去调查。耳朵听到的不一定真实可靠，不能“信耳不信目”。必须用眼睛看到的，纠正用耳朵听到的，“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败目”。刘劭充分意识到了人才的复杂性，提出要客观看待人物的声誉，评价人才也不能简单地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根据。众口一词肯定的人，也有邪恶不善的，因为有的人违背正道，屈从派别利益，联合起来称赞他。大家一致非议的人，也可能才华奇特，与众不同。有的因为上下级关系处理不好而遭到非议，有的因为曲高和寡，鹤立鸡群而受到排斥、孤立。因此，刘劭说：“故皆合而是，亦有违比；皆合而非，或在其中。”得出的结论是：“耳听所求，以多为信，是缪于察誉者也。”只偏听偏信多数人的意见，也会造成识人不准。这点对我们的启示：考察干部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不能只听部分人的褒

贬毁誉，应加强实际考察，客观分析，全面评价。重视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但不能唯票取人，以声誉取人，避免重用那些善于沽名钓誉的人，遗漏那些敢于担当的人才。

“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待人接物容易受到个人爱好的迷惑。“夫爱善疾恶，人情所常；苟不明贤，或疏善善非。”喜爱善良，厌恶邪恶，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不能认清人的实质，也许会疏远善良的人，亲近不良的人。邪恶的人，既有百非，必有一是，“以其所是，顺己所长，则不自觉情通意亲，忽忘其恶”。正因为邪恶的人所具有的长处正好顺应符合了自己的长处，就可能觉得情投意合，忽略了他的邪恶。“善人虽善，犹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长；以其所长，轻己所短；则不自知志乖气违，忽忘其善。”善良的人也有不足之处，他的不足之处，不能用来证明自己己长处，其长处又贬低了自己的短处，所以觉得志趣不投，精神相离，忽略忘掉了他的善良。评价人才时，仅凭个人喜好，“惑于爱恶者也”。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考察评价干部要客观、公正、摒弃个人好恶和偏见，避免好同恶异，不拘一格，广纳贤才。

“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误”。审查人的心志时，容易出现对志向大小不做具体分析的错误。刘劭认为，心志也是考察人才的基本内容。“志欲宏大，心欲微小。”“志大所以载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容悔也。”志向宏大，才能担负天下重任，谦虚小心才能谨防过失和悔恨。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就会拘谨懦弱，缺乏勇气和担当。这点对我们的启示：考察评价人才，要对人才的志向大小做具体分析，避免误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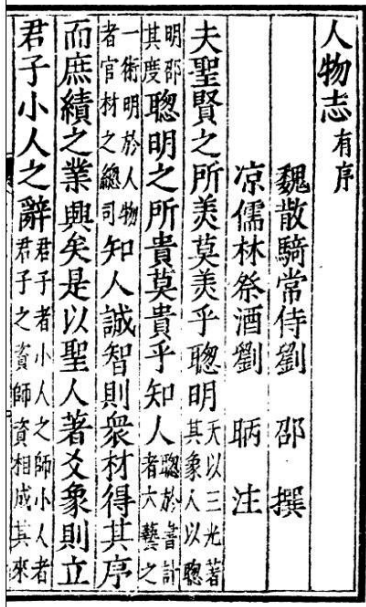
“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评定人的素质时有分不清聪慧早成与大器晚成

的可能。要以发展的眼光，全面地考察人才。有些人的才华早年就锋芒毕露，“材质精达”，有些人“晚成者奇识而舒适”。二者要区别对待，适时选用，不因年幼而轻视，不因年高晚成而嫌弃。这点对我们的启示：选拔干部应不拘泥于年龄，搞一刀切，给不同类型、不同年龄的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和舞台。

“五日变类，有同体之嫌”。辨别人才类型时，有对同类人才相敬或相争的疑惑。刘劭深刻地洞察人性，描绘了考察和评价人才时的微妙心理。“皆亲爱同体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序异杂而不尚也。”亲近喜爱与自己同类型相反的人，并进行诽谤。对于类型不相同，非相反的人不憎恨，也不推崇。“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性情相同而才能有别的人，相互援助，相互依赖。性情相同而能力相当的人，就相互竞争、相互嫉妒。以至于在选拔人才时出现了“助直而毁直，与明而毁明”的现象。担心别人的正直、廉洁、英明超越了自己，而诽谤诋毁他人。这点对我们的启示：选拔举荐人才应该避免自私、嫉妒等阴暗心理作祟，真正做到大公无私，为国举才。

“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评论人才可能犯捉摸富贵者，压抑贫困者的错误。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而富贵顺达，有些人能力受到压制而贫贱穷困。“富贵遂人，势之中也；贫贱穷匮，势之压也。”这点对我们的启示：不能根据目前的境遇、现状评价一个人的能力，歧视那些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的人。选拔人才应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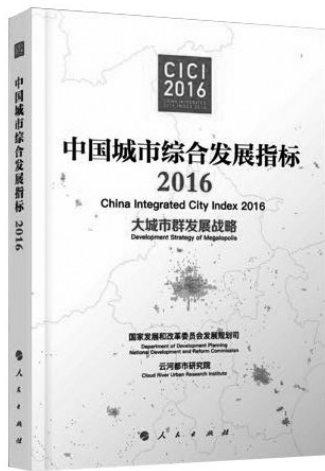
“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观察奇



才时，有认识尤妙尤虚之类人才的失误。尤妙尤虚的人与众不同。“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矜言瑰姿，内实乖反。”尤妙之人外表平淡，不爱伪饰而精明深藏胸中，尤虚之人言辞夸大其实，姿态优美动人而内心不实。一般人无法看透本质，容易形成错误的认识。这点对我们的启示：选拔人才不能信伪迷真，误用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人，遗漏了踏实能干、质朴无华的人。

宋代的阮逸评论《人物志》说：“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药括。”

干部国学院



城市化承载了人类追求品质生活的美好向往与理想。近年来，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飞速发展，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增至2015年的56.1%，增加了382个百分点。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城镇空间扩张与人口聚集，也带来了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大等后果。比如说，我国部分地区“雾霾”天气频发，环境学家们已达成共识：是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飞速发展所造成的细颗粒物（PM2.5）爆发性增长遇到自然客观不利于扩散的气象条件时所呈现出的天气表象。目前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不仅呈现出环境污染、资源紧缺、交通拥堵，还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安全和社会保障困难等诸多的“城市病”。

无论从社会经济发展均衡性，还是自然环境约束性来看，我国城镇化发展都到了关键的转折点。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生态文明、文化传承、四化同步的全面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战略导向。如何将战略的导向具体化，给出相对科学的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司、运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写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一书为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该书以国际化视野，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和最新理念进行了数字化、指标化的梳理，经过中外专家四年反复研讨，构建了以环境、经济、社会为三个维度，以生态优先、经济质量、社会服务为基本思想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均衡发展的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这也是迄今为止，现行的各类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最完备和科学的指标体系，确实为我国城镇化的绿色化、集约化、均衡化和可持续化发展提供了规划指引。

该书除了给出指标体系之外，还利用具有实际价值的统计数据、卫星数据与地理空间数据，尝试对我国城镇化进行了科学分析，发现人口密度局部布局过密或过疏，与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能力不匹配的现象，是造成诸多“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同

别业冬、春不同季节的景物。关于春景，王维紧扣“春”的特点，这样写道：“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意为等到春天来临，草木蔓延生长，山景颇可赏观。不仅为春景作了总的概说，也为下文实景描写作了铺垫。王维选取了春天山中最具代表性的景物：“轻簾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雉”，使辋川春景显得生机勃勃，从中也可窥见王维空寂的心境和悠游自在的生活。全文景中含情，情由景生，情景交融，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和深刻的感受。故清末民初学者高步瀛这样评价：“昔人谓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文幽隽华妙，有画不到之处。”

王维，字摩诘，是我国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又是位著名画家。同时，佛禅思想对王维的诗文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他以禅入文，文以禅显，营造出了空寂冲淡的艺术意境。（杨立新）



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科学研究设计

□ 李 昕

时，该书还对比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重要的城市群发展特征和优势，也指出了城市群地区的问题，对单体城市和区域间的空间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生产力合理布局等具有科学指导意义，对于我国构建具有综合实力的、可参与国际化竞争的城市群是大有裨益的。

应当说，本书给出了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指引下，未来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的评价标准。此外，它也为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可考核量化的具体指标体系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城市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也是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本书的确给出了崭新的参照。同时，书中的指标体系是开放的，可以针对不同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品质需求，具有较强的普适性。